

在文艺论争中

郑伯农

6.7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9

在文艺论争中

郑 伯 农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字数：167千 插页：2

198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册

统一书号：10157·159

定 价：0.60元

目 录

评“三突出”	(1)
评“四人帮”的文艺观	(14)
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民主	(39)
现实主义——曲折的道路	(57)
心理描写和意识流的引进	(72)
坚定地正确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9)
重话“双百”	(103)
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09)
分歧在哪里	(116)
——答蔡天心同志	
科学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	(123)
科学地看待文艺的社会效果	(141)
对一种批评的反批评	(153)
不必把比喻当科学定义	(158)
——也谈“香花”和“毒草”的概念	
生活的发现和艺术的创新	(161)
创作的数量和质量	(167)
短一些吧！短篇小说	(170)

“爱情”的“位置”	(173)
《小院》的风波和评论的倾向	(190)
漫话一九八一年的电影创新	(199)
浅论歌剧中的戏剧与音乐关系	(216)
对发展新歌剧的几点意见	(237)
后记	(248)

评 “三 突 出”

长期以来，在文艺界盛行着一种理论——“三突出”。即所谓“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尽管这种理论荒谬绝伦、矛盾百出，然而，凭借着“四人帮”的淫威，它却一度成了文艺创作的神圣法则。“四人帮”的卫道士们手持棍子和帽子，讨伐一切敢于对“三突出”表示不敬的人们。“四人帮”的理论家们发出阵阵鼓噪，把这种理论吹捧为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这是一种靠谎言装扮起来的理论，是一种靠权势强迫人们遵循的法则。

— “三突出”的由来和发展

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作了两个批示之后，我国文艺领域掀起了激烈的波澜。就在这时，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加紧插手文艺运动。她一方面窃取革命现代戏的成果，把自己打扮成革命文艺的“培育”者；另一方面，提出种种修正主义谬论，把自己打扮成

革命文艺理论的发明家。所谓“三突出”，就是江青之流炮制的破坏革命文艺的谬论。

早在一九六四年，江青就提出：“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命题”，抛出了“三突出”的“理论根据”。

一九六五年，江青插手京剧《平原游击队》的创作。她提出：“怎么写？突出李向阳第一。”她要求压低其他的人物来突出李向阳。在这里，“三突出”的思想已经发展得颇为具体。

一九六八年，“四人帮”的一个亲信在上海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三突出”的口号。他写道：“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这个亲信，后来又提出了所谓“三陪衬”，作为“三突出”的补充。即：“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一般人物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

最初，“三突出”是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随着“四人帮”窃取的权力越来越大，这个理论的“级别”也就越升越高。一九六九年，北京的一家杂志刊登姚文元亲自修改的一篇文章，公然将“三突出”尊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一九七二年，“四人帮”操纵炮制的一个文件，进而将“三突出”奉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这就是说，不但戏剧、电影、小说，就连那些不一定表现人物形象的诗歌、绘画等，也统统要“三突

出”。接着，“四人帮”便用行政命令来推广“三突出”。

“四人帮”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报刊叫嚷道：对于“三突出”，“绝不能搞什么灵活应用，而必须以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高度自觉性，认真学习，坚决运用”。他们准备好一顶帽子，谁不实行“三突出”，就是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他们甚至恫吓道，否定“三突出”，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就是“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整个社会主义时代占主导地位”。

“三突出”的升级是否到此为止呢？不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提出“写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口号，大喊这是当前最迫切、最重大的创作主题。他们对于“三突出”的宣扬，达到了高潮。他们叫嚷，要“把英雄人物作为中心人物来写”，要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突出“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典型”。他们的所谓同走资派斗争，就是打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号，打击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就是“四人帮”及其党羽，就是王、张、江、姚以及张铁生、翁森鹤之流。他们发疯地吼道：要争“座次”，让“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始终“占领第一把交椅”；“这个‘座次’总是要排的，这个‘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总是要争的”。请看！这就用赤裸裸的语言告诉人们，所谓“三突出”，“最迫切”、“最重大”的就是用文艺来突出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去为他们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去为他们当女皇、当总理、当委员长的篡党夺权阴谋制造反革命舆论。“三突出”的要害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突出“四人帮”，突出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突出他们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

二 万古不变的创作模式和等级森严的“三突出”王国

“三突出”规定了一整套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要求文艺家按照这种既定的关系去构造作品、刻画人物。

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是现实生活中人和人关系的反映。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写好人物之间的关系，是文艺创作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根据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真实地典型地表现这些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三突出”是怎样表现人物关系的呢？它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系统归结为层层突出的关系，陪衬与被陪衬的关系，铺垫与被铺垫的关系。而不管是表现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管是表现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管作品中的角色处于何种环境、何种矛盾冲突之中，一律如此。正象杜林给世界规定了一个模式一样，“三突出”也给文艺规定了一个千篇一律、万古不变的模式。一切文艺必须按此就范，不得越轨。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三突出”把生活模式化，造成文艺创作的雷同化；还在于它严重地歪曲了生活。“四人帮”的舆论工具宣扬道，“三突出”“正确地反映了在无产

阶级专政下我国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对，它恰恰严重歪曲了社会关系。

按照“三突出”的法规，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应当分成三六九等，构成一座一级压着一级的宝塔，形成等级森严的阶梯关系。居于宝塔顶端的是“一号英雄人物”，即主要英雄人物。它的下面依次是非主要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等等。一级衬托着一级、一级比一级突出。一切人物对于主要英雄人物，都要“如众星之拱明月，绿叶之扶红花”。而所谓的群众脚色，不过是英雄的啦啦队，他们在文艺作品中的唯一作用就是扮演活道具，充当垫脚石，给英雄人物吹喇叭、抬轿子，作“远铺垫”、“近铺垫”，以突出英雄、抬高英雄。古罗马把奴隶称为会说话的工具，“三突出”把群众当作会说话的道具。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过去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三突出”的“文艺王国”里，我们不是看到了同样的情境吗？

“四人帮”在论证“三突出”的时候，经常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但是这句话并不能作为“三突出”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同志是在批评那种认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观点时，举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作例子，说这种文学是以写光明为主，以此证明并非历史上的一切文艺作品都是光明与黑暗并重。毛泽东同志并没有让人们照抄照搬苏联文学，更没有把它作为我国文艺创作的普遍原则。毛泽东同

志举了苏联文学作例子后，讲了一条重要原则：“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从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言论里，怎么能引出“三突出”的荒谬结论来呢？很清楚，生活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的陪衬与被陪衬的关系，资本家不是为了陪衬工人而活着，“小人物”不是为了陪衬“大人物”而活着。事物之间存在着对比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比包括着衬托，但是对比、比较都是互相的。红花因绿叶的对照而更显得红，绿叶难道不因红花的对照而更显得绿么！文艺作品在刻划人物的时候，不能分散笔墨，要把艺术描写集中在主要人物身上，这是创作的常识。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违反生活真实，任意抬高一些人在生活中的地位，贬低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按照“三突出”的逻辑，反面人物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自己极端的愚蠢和低能，来反衬英雄人物的英明与伟大。他们不过是一堆草包、饭桶，一旦遇到英雄人物，犹如鸡蛋之碰石头，豆腐之遇雷公。而英雄人物即使身入敌群甚至身陷囹圄，也能够处处显出“占压倒优势”。天下哪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呢？“三突出”不但歪曲了敌我关系，也是严重地歪曲了人民内部关系。在“三突出”的作品里，群众不过是一群毫无历史主动性的群氓，不过是只会跟着别人摇旗呐喊的芸芸众生。英雄人物和群众的关系，成了上智与下愚的关系。“四人帮”的理论家甚至宣扬道，主要英雄人物应当在一切场合占“支配地位”。所谓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戳穿了，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难道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和群众之间，竟是这样一种关系吗？如果说，“三突出”反映了什么，它

恰恰反映了“四人帮”一伙对于广大群众的奴役、压迫关系。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地主阶级的文艺舞台把历史根本颠倒了，人民群众被写成渣滓。我们可以看到，“三突出”同样把历史颠倒了，在“陪衬”、“铺垫”等名目下，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被重新写成渣滓。这是文艺领域的触目惊心的复辟倒退，是“四人帮”掀起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主宰一切的英雄人物

按照“三突出”的理论，文艺创作的中心，就是塑造一个至高无上的主要英雄人物形象。

一般地说，各个阶级都要在文艺作品中塑造本阶级的理想人物形象。特殊地说，作为代表未来的阶级，无产阶级十分重视在文艺中塑造英雄形象。问题在于用什么观点写，写什么样的英雄人物。无产阶级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描写人民英雄，剥削阶级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吹捧自己的代表人物。“三突出”是怎样塑造英雄人物，他们要塑造的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呢？

“三突出”论鼓吹道：“在创作过程中，所有人物的安排和情节的处理，都要服从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前提。”主要英雄人物应当在矛盾冲突中成为“主导力量”，始终占“支配地位”，甚至“始终居于主宰地位”。很清楚，这种英雄，是个人决定一切的英雄，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英雄。

“三突出”论还鼓吹道，主要英雄人物的“起点要高”，不能写“成长中的英雄人物”。如果写了主要英雄人物“从存在缺点到克服缺点的过程”，“这只能起到往主要英雄人物脸上抹黑的作用”。英雄一出场，就应当“是一尊完美的雕像”。在任何场合，都要用“最好的语言，最美的音乐，最挺拔的表演动作，最重要的舞台位置和最突出的灯光服饰”，对英雄进行“热烈的讴歌”。很清楚，这种英雄，只能是“先验”的英雄，没有成长过程，不能一分为二，一出世就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

可以看出，“四人帮”的所谓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就是用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来塑造他们的理想人物。这种人物不需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也无需经过实践锻炼，从娘肚子里掉出来，就是高大完美的。他们是神灵、是主宰，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手里拿着指挥棒，任意指挥党，指挥群众，仿佛整个地球都要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京剧《磐石湾》中的陆长海，“自有那钢筋铁胆”，“自有那伏虎神通”，连国民党特务都夸他“神通广大，赛过火眼金睛”。这个英雄不到十岁，就干了一桩拯救全村的业绩。当所有的贫下中农都看不懂刀鞘上的暗语的时候，这个“天才”一眼就识破了。恰如宇宙的一切奇迹都由“上帝”来“创造”一样，磐石湾的一切奇迹都由陆长海来创造：降伏08、抓裘二能、救阿团、俘虏丁文斋、骗来敌军二支队、打信号报敌情、擒获黑头鲨……。就连阿团扳倒消息树，也是学着他二十年前的榜样干出来的。这是一个法力无边的“超人”。影片《海霞》描写了一位老民兵给青年民兵讲革命传统，帮助青年们提高觉悟。“四人帮”大肆攻击，

说这是让次要人物教育主要英雄人物，是贬低英雄。按照“三突出”的逻辑，群众是不能教育英雄的，英雄应当“生而知之”。影片《创业》塑造了华程这个党的领导干部形象，描写了他对周挺杉的帮助。“四人帮”攻击道，这是“抬高华程”，“贬低周挺杉”。按照“三突出”的逻辑，“老子”就是党，“老娘”就是党，党是不能教育“英雄”的，只能由“英雄”来教训党、改造党。总之，“三突出”的“英雄”，有着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无限权力，没有接受教育、接受帮助的半点义务。“四人帮”为了突出“英雄”的所谓“反潮流”精神，可以丑化党、丑化群众，不惜把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群众描绘得浑浑噩噩，以衬托“英雄”的鹤立鸡群。

“四人帮”说，按照“三突出”原则塑造的英雄人物就是“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天下哪有这样的无产阶级典型？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显著区别，就在于他们代表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永远和群众在一起。他们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永远依靠广大群众。他们是群众的普通一员，又是率领群众前进的先锋战士。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决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显贵。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处处以先知先觉者自居的人物，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只能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暴露对象。这种人物，无非是“四人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在文艺上顽强的自我表现，是按照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反动愿望塑造出来的人物。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恩格斯曾经揭露过一种人：“好吹牛皮、象癞蛤蟆一

样不自量力”。“四人帮”正是这样一种大言不惭、不知羞耻的人，他们就是现实生活中“三突出”的人物。

“四人帮”通过他们的舆论工具宣扬道，文艺作品以什么样的人为主角，这是哪个阶级在舞台上实行专政的问题，也是政治领域中谁专谁的政的反映。这句话很值得注意。为什么“四人帮”要在文艺舞台上那样地神化他们的英雄人物？为什么“四人帮”要把他们的英雄人物抬得那么高、摆得那么突出？为什么他们竭力让英雄人物主宰整个舞台，并且竭力把这种主宰和现实生活中谁专谁的政，谁来主宰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四人帮”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统治全中国，他们要在中国复辟封建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在政治上竭力美化自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在舞台上也就竭力神化英雄的力量。他们在文艺舞台上“大树特树”英雄人物的“绝对权威”，正是为了给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实行法西斯专制独裁制造舆论。

四 唯心史观的沉渣泛起

“三突出”在理论上是十分荒唐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反动的，在实践中是十分有害的。

“四人帮”放肆地叫嚷，六条标准是“最低要求”，“三突出”是“最高标准”。他们用“三突出”取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作为文艺批评的法律，审判文艺作品的尺度。一切革命文艺在“三突出”的法庭面前都是不合法的，都要被褫夺其演出权、发表权。歌剧

《白毛女》的主角不是“三突出”的英雄人物，被扣上“写中间人物”的帽子，一棍子打死，江青下令，改成以王大春为主角。《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写了两个普通的老乡，这还了得！江青下令，重写《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把“张老三，我问你”改成“指导员，我问你”……。

“四人帮”拿着“三突出”当枷锁，套在社会主义文艺的脖子上。你要创作么！必须按照“三突出”的模式，先确定主题，设置“一号人物”，再根据突出“一号人物”的需要，安排矛盾冲突，编造故事情节，再设置“二号人物”、“三号人物”、一般人物、反面人物……。文艺创作成了唯心主义的主观胡诌，成了形而上学的僵死拼凑。而且，只能写“三突出”的“英雄”，不能写真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不能塑造英雄群象，不能写成长中的英雄人物，不能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典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被破坏，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文艺创作被引进死胡同，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被摧残得不象样子。

这种理论扼杀了大量革命香花，也催发了一批反革命毒草。特别是近年来，他们打着“写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突出“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的旗号，直接利用文艺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在《反击》、《盛大的节日》这一类作品中，一方面，他们用最下流的笔触丑化党，丑化人民，丑化社会主义，丑化中国革命；另一方面，用最肉麻的语言，美化“四人帮”一伙，为他们一伙树碑立传。所谓赵昕、江涛、井峰、铁根之流，不就是按照王张江姚及其死党的模子制造出来的吗？他们把这些人物塑造得无比“高大”，

野心家、阴谋家成了“救世主”，煞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似乎整个中国都是黑暗的，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光明。仿佛只有推出他们“占领第一把交椅”，“改朝换代”，中国才有救；离开他们，中国就要“沉沦”。恩格斯说：“至于说到大言不惭，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看来，最高纪录是属于“四人帮”的，他们在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嘘方面，远远超过了一切前辈。

“三突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不过是几千年剥削阶级思想沉渣的泛起，不过是天才论和英雄史观在文艺中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和英雄史观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十九世纪中叶，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狂热地宣扬：“人民即无知大众”，“强盗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历史是靠少数强盗式的阴谋家进行“密谋”来推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论著，彻底清算了巴枯宁的唯心史观。十九世纪末叶，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民粹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民粹派把人分成“英雄”和“群氓”，宣扬“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群氓”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列宁和斯大林写下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著作，给民粹派以粉碎性的打击。在中国当代的历史舞台上，林彪是英雄史观的重要吹鼓手。“四人帮”和林彪在政治上相互勾结，在思想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是林彪反党集团的理论纲领，也是“四人

帮”的思想旗帜。林彪自比“天马行空”，江青自比“江上奇峰”。林彪吹嘘自己有一副天生特别灵的好脑瓜，在文艺方面宣扬“灵感论”；江青自封为“旗手”，在文艺方面大搞“三突出”。一个认为文艺是靠天才人物的“灵感”创造出来的；一个认为文艺就是要去突出那些“创造一切”的天才人物。一唱一和，互相配合，两种花样，一路货色，都是从天才论和英雄史观的阴沟里流出来的污水。林彪在台上的时候，“四人帮”和林彪狼狈为奸。林彪垮台了，“四人帮”拿起林彪的接力棒。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林彪反党集团。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庇护，林彪集团的罪行没有受到清算，他们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也没有得到批判，被“四人帮”继承下来，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在文艺方面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三突出”创作理论体系。

林彪鼓吹“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是为了建立他的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四人帮”鼓吹“三突出”，是为了建立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帮王朝”、“江氏王朝”。然而，历史的车轮终究不会按照反动派的愿望而倒转。他们的“帮王朝”还没有来得及开张，就破产了。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三突出”，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落得遗臭万年。

一九七七年四月